

## 自私、剥削和利润动机 安东尼·傅卢(Antony Flew)<sup>1</sup>

此外，不断重复那些不正确有时甚至是不切情理的断言，没有比这更为无聊了；如果我们能减少一些这样的重复，这将非常有益。

- 约翰·奥斯丁<sup>2</sup>

因为资本主义经济被认定是由利润推动的，相比于社会主义计划经济替代方案，竞争的资本主义经济必然是特有的和本质的自私，比之上述不停重申的断言，找不出一些是约翰·奥斯丁教授迫切希望减少的更加引人注目的实例。

### 不道德的资本主义：从托尼到拉姆齐·麦克唐纳到爱因斯坦到对普兰特

因此，无需回顾更早的时期，托尼(R.H. Tawney)在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之后不久出版的第一本预言性的书中，就一直批判任何其认为“运行其中的产业不是作为服务公众的专业机构，而是为了股东利益”的体制。所以，他希望“解放那些做建设性工作的人们...将他们的精力利用到产业的真正目的，即提供服务”。他满意地表示：“相当数量的产业领域内，**合作运动**已经用社区服务动机取代了利润动机。”<sup>3</sup>

几年后，托尼的这些想法得到了两度出任首相的拉姆齐·麦克唐纳的回应：把“资本主义改造成社会主义...，产业必须由唯利是图转变为承担社区服务并由服从于其的合作事业。”<sup>4</sup>很久以后，在阿尔伯特·爱因斯坦逝世前的几个月，《国际社会主义评论》援引他的话说：“资本主义社会在经济上的无政府状态...是我们罪恶的主要根源。从事生产是为了利润，而不是为了使用。”并且持续不断，似乎没有结束的一天。

1972年夏天，在大字标题“等待来自利己主义者的信号”之下，伦敦《泰晤士报》报道了巴西卡马拉大主教(Archbishop Camara)向议会两院与会的议员提出的问题：“你们为什么不去直接道破对社会主义的严重曲解，就如俄罗斯和中国的社会主义？你们为什么不坚决地声讨资本主义内在的自私和冷酷？”尽管雷蒙德·普兰特(Raymond Plant)教授经常被认为其勇敢地争取即使带着罕见的固执，去接受“现实存在的社会主义”是无可否认的失败，但是他如今也只是勉强承认：“在一个充满人性的社会中，确实**可能**为市场留有空间”（加粗强调），然而，他仍然强烈坚持这些市场都必须严格地加以限制，“因为这些市场鼓励某些形式的行为而不鼓励其他形式的行为，即，利己主义优于利他主义，利益的理性计算先于信任”<sup>5</sup>。

### 为什么只有利润是从心理学上解释的？

对于大主教的第二个问题，第一个最好的答复是另一个问题：“我们为什么从来没有听过租金动机或工资动机呢？”也许利润和租金之间的经典区别已经过时了。但是，如果言及利润动机是合

---

<sup>1</sup> 安东尼·傅卢(1923年2月11日-2010年4月8日)，英国哲学家。

<sup>2</sup> 约翰·奥斯丁，《感知与可感知之物》，克拉伦敦，牛津(Clarendon, Oxford)，1962年，第50页。

<sup>3</sup> R·H·托尼，《贪婪的社会》，贝尔出版社(G. Bell)，1921年，第140页、150页、152页。

<sup>4</sup> 引用自萨缪尔·拜耳(S. H. Beer)，《集体主义年代的英国政局》，劳特利奇出版社，伦敦(Routledge, London)，1972年，第136页。

<sup>5</sup> 肯尼斯·赫文(Kenneth R. Hoover)和普兰特，《英美两国保守资本主义评述》，劳特利奇出版社，伦敦(Routledge, London)，1989年，第232页。

理的，那么提到工资动机同样也应该同样是恰当的。由此类推，我们不得不将固定利益动机、最高价格动机和最佳购买动机纳入新的经济心理学。当然，如果被支付工资的那些人必然是由工资动机驱动的论点是合适的话，那么，支付工资的时间间隔更长且其工资因此被称为薪水甚至报酬的那些人，分别地由薪水动机和报酬动机驱使，这不仅仅是合适而且是绝对正确。<sup>6</sup>

这一直接反问的目的是为了引出两个观点。第一：坚持将心理学应用于发展自并适于经济学分类的一套体系，这是个误导。坚持这样做，更像是假设一套国际象棋动机，这些动机参照被确认为与国家象棋大师兴趣和目的有关的相似性和差异性，从中一一区别开来，然后将这些人为的假设用从国际象棋技术词汇中提取出来的措辞来标识——骑士跳跃动机，愚者自将动机，卒成女王动机，或者其他动机。

有意思的是，比较这里一个经典的作出这种误导的例子。在《人性论》中，大卫·休谟成功地发现，“想要一千英镑的人，实际上有一千个或者更多的要求，而这些要求合起来似乎仅构成一个强烈的欲望；不过，随着要求每发生一次改变，通过偏好越大的数字（如果仅能由一个要求集合胜出），这一欲望就显示出是由无数个要求组合而成的。”<sup>7</sup>注意到隐含的“一千多个[要求]”，可能诱导着我们继续推进，在十进制面前，一千英镑的要求，实际是，二十四万个旧便士的要求，现在已减少到十万个新便士的要求了。

第二个应当由上述直接反问引起的观点是，如果打算将经济学或国际象棋中的某个系列的某些概念引进至心理学，那么仅引入其中一个概念而不引入其他概念，总而言之是武断的——提到骑士跳跃动机而没有卒成女王动机，或者言及利润动机而没有工资动机。

### ***如果要求工资和薪水不是不道德的，那么想要利润为什么是不道德的？***

对于卡马拉大主教提出的问题，第二个回应是坚决主张人们没有任何权利简单地假定获取（私人）利润的欲望总是必然是自私的和可耻的，而相反的是，取得工资、薪水或者报酬的欲望显然不是自私的和可耻的。

毫无疑问，所有这些各色的欲望是利益相关的，在这个意义上，受那些欲望指引的人们，按照达蒙·鲁尼恩（Damon Runyon，百老汇的巴尔扎克）不朽言论的话来说，“正在努力做到他们最好的”！但是，正是因为这样做平等地适用于所有欲望，我们无法找到可以责骂其一而放过其二的理由。

对于谴责者，这一被忽视的事实令人尴尬。当然，没人会如此不切实际地去相信任何一种经济组织能够放弃所有这些有利益关系的动机，我们甚至可以在一本虔诚的社会主义宣传册中阅读到，“每个为普通人设计的经济体制”，“必然有自身利益作为其推动力。”<sup>8</sup>因此，如果有这样一个经济体制因为“本质上的自私性和缺乏同情”而受到谴责，那么，同样的道理，所有的经济

---

<sup>6</sup> 伯纳德·曼德维尔在《蜜蜂的寓言》对两个单音节词汇“工资”（Wages）和“薪水”（Pay）极为相似的同义词做出了最恰当评论，企鹅出版社，哈芒斯沃斯（Routledge, London,），1970年，第66页：

当人们了解他们的黑话时，  
他们把它改成了“酬金”；  
不愿意是短期的或简单的，  
有关的增益任何东西...

<sup>7</sup> 大卫·休谟，《人性论》，第一卷，第三章，第十二节，克拉伦敦，牛津（Clarendon, Oxford），1978年，第141页。

<sup>8</sup> 威廉·阿瑟·刘易斯，《经济计划的原理》，费边社（Fabian Society），1949年，第7页。

制度必须受到如斯谴责。当然，那不是下述这些人所要的，他们因此谴责资本主义的根源和支流而同时，就像有些“严重的扭曲”，宽容地忽视能够引导自身认识到的社会主义的谬误的人们，尽管勉强。

### 利益相关的行为不一定是自私的

这里有个更深层次的和根本性的错误，并且，这一错误确实不应该被任何人以夸大的做法，造成其作为道德和精神指南。因为，尽管自私的行为可能总是利益相关的，但是只有一部分利益相关的行为是自私的。去指称某一行为是自私的，比判定其利益相关，包含更多意义。自私总是并且必然违反规则。但是利益相关并不违反规则，并且几乎不可能违反规则。

例如，当两个健康的孩子迫不及待地吃晚饭时，我们说这两个孩子各自寻求他或她自身的利益，可以假定为正确；如果涉及任何选择，毫无疑问地，经济学家会将这些选择描述为最大限度地发挥其效用。然而，这不是开始谴责这两个孩子的充分理由。谴责的时间应该在弟弟抢了姐姐的晚饭之后，或者在用不太明显的方式拒绝适当地考虑他人和尊重他人应有的主张之后。即使在赢得成功只能够以别人的失败为代价时，坚持认为追求自身的利益总是必然是自私的，太过苛刻。是难道有人准备说，对方候选人不退出竞选为其他候选人让出道路，而去竞争同一令人垂涎的位置是该罚的自私？

所以，结果是，仅仅因为某一经济制度依赖于并且与利益相关的动机有关，或者甚至仅仅是因为它允许或鼓励人们在某些零和冲突的情况下追求自己的利益，而去废除任何一个在“本质上是自私和无情的”经济制度，是经不起考验的。如果在想要获取（私人）利润中有些特别令人讨厌的东西，那么（私人）利润在本质必然有什么东西[令人讨厌]。它几乎不可能只是与想要获得某些经济商品有关，同样地，也几乎不可能与在任何零和冲突的情况下竞相收购一些稀缺的经济商品有关。

### 亚里士多德对利润的批评

认为获取利润在本质上是真正地可耻，因此，获取利润的欲望也有些可耻，这是与古希腊哲学家一样悠久的想法。仔细想想，那位依然拥有最大影响力，并且主要通过阿奎那和黑格尔继续发挥此影响力的哲学家说过的话。

讽刺的是，亚里士多德的经济思想主要是在《政治学》中发现。其中一个特点是，亚里士多德将任何其相信为自然意志的事物认可为规范。对于那些倾向于遵循这个路径的人，发现于何处受到亚里士多德的影响是有益的：

现在，如果自然不会漫无目的或者徒劳地创造任何事物，那么所有动物必须是生来为了人类而产生的。由此得出结论，在某种意义上，战争的技术是进行获取的正常方式。狩猎是这种技术的一部分：并且狩猎应当予以实践，不仅是针对野生动物，还是针对那些命定被他人统治并反抗遵守这一命运的人。这种战争自然是正义的<sup>9</sup>。

---

<sup>9</sup> 亚里士多德，《政治学》，在 R. 麦基恩（R. McKean）主编的《亚里士多德基本作品选》，1256B20-26，兰登书屋，纽约（Random House, New York），1941年，第1137页。这也许是值得强调的是，一方面某些古希腊人认为，只有野蛮人（即非希腊人）应该被奴役，当时，当时没有人提出这种命运仅适用于非白种人。

看完这段话，人们不会出乎意料地发现，亚里士多德所预设的理想的普遍的供给者是**自然**，而不是像现今一样，是国家。因此，他的立场不难让人想起其同时代人的立场，无论是神职人员还是世俗人士，那些人认为，以可以直接交易的商品和服务形式出现的所有财富，是直接由**神灵**创造的，因此，那些财富没有任何合法的优先的所有权主张，它们可以按照“所谓的正义”的推定原则而进行彻底的再分配<sup>10</sup>。

就像我们已经注意到的，一个普遍的观点是，财产的提供应当唾手可得。向每个被带到这个世界的人提供生存资料是**自然**的义务：并且这一事实表现在动物的后代总是从生育其的胎盘残留物中汲取营养<sup>11</sup>。

这是世界亏欠我们生计这一人所共知的粗鄙学说的高尚又经典的表述，之后，有意味的是，亚里士多德强调进行获取而不是进行生产：

因此，获取技术的自然形式始终是，并在所有情况下是，从果实和动物中获取。获取技术...有两种形式：其中一种与...贸易相关，另一种与家庭管理相联系。这两种形式中，后者是必要的和值得赞扬的；前者是交换的一种方式，受到应得的审查，因为这种交换产生的增益不是天然创造的，而是在损害他人情况下产生的<sup>12</sup>。

这里引发的一个观点是，这种交换（贸易）在本质上是剥削。亚里士多德认为，任何交易者的获得必然损害该交易者对象的利益，而唯一值得赞扬的获取是那些直接从非人类的**自然**中得到的。剥离这些符合和不符合**自然**意图的概念，亚里士多德的概念与下列文献发现的观点，持相同的论断，犯一样的误解，即在《给未来者言》中：“每当交换后产生重大增益时，对于增加的每一单位，就有一个精确的同单位同等量的减少。”<sup>13</sup>

这一非输即赢的观点，已经存在了几个世纪，并且仍然是一个流行的误解，也许现在，在特别谈及所有劳动（力）贸易时，尤其更甚。例如，好像是最没有争议的老生常谈，解释不存在马克思主义邪恶的一位作家声称，“资本主义的神秘性...掩盖了，在一个价值平等的交换形式下，通过自由的雇佣合同机制，利益从工人向雇主转移。”<sup>14</sup>

这里，亚里士多德开创性的错误为引述一位诗人兼学者对其对手疏忽的驳斥提供了一个始终受人青睐的理由：“‘三分钟’的思考就足以发掘出真相；但是，思考令人讨厌，而三分钟过长。”<sup>15</sup> 症结在于贸易是一种互惠的关系。如果我正同你交易，那么必然是你正跟我交易。对于双方而言，贸易必然也是自愿的。照此来看，你能够以武力从我处夺取的事物不可能通过贸易获得或者

---

<sup>10</sup> 按照罗伯特·诺齐克巧妙的话说，这是“来自天上的甘露”。比较一下安东尼·傅卢的“上帝的创造，财富的创造和闲置的再分配者”，见 D·安德森主编的，《善意的戕害：教会对复杂社会问题的简单化回应》，基督教知识普及协会出版（SPCK），1984 年；同时见罗纳德·纳什（Ronald Nash），《贫穷和财富：基督教就资本主义的辩论》，十字路口出版社（Crossway），1986 年。

<sup>11</sup> 亚里士多德，《政治学》，1258A33-6，麦基恩主编，同前，引用自第 1140-1 页。

<sup>12</sup> 同上，1258A37-1258B2，麦基恩主编，同前，引用自第 1141 页

<sup>13</sup> 约翰·罗斯金，《给未来者言》（*Unto This Last*），安伦出版社（G. Allen），第 131 页。这本强烈反资本主义作品深深影响了圣雄甘地和英国工党的大部分奠基人。

<sup>14</sup> 戴维·米勒，《社会正义》，克拉伦敦，牛津（Clarendon, Oxford），1976 年，第 204 页。

<sup>15</sup> 阿尔弗雷德·爱德华·豪斯曼（A. E. Housman），《西罗普郡少年》（*Juvenales Saturae*），再版，剑桥大学出版社（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1931 年，第 11 页。

出让。如果任何对于交易一方可能产生的贸易利益只能以交易另一方某些相应的损失为代价，那么就会出现这样的情况，在任何商业交易中，至少有一方必须是傻瓜，受虐狂或者赌徒。

### **贸易发生的原因是买家想要获得商品而卖家想要取得收益**

但是，在不受到理论或情绪的影响下，所有人必须承认的事实是，卖方售出[商品]是因为在其实质情况下，卖方愿意接受[商品]价钱而不是保留商品，相应地，买方购买[商品]是因为在其实质情况下，买方愿意支付[商品]价格而不是没有商品。因此罗斯金错了。贸易的本质不是一方的任何利益仅能在损害对方的情况下获得，而是，除非双方相信，不论对错，他们能因此获取利益，或者除非相比其他可替代的交易和不进行交易，双方至少更倾向于这一实际发生的交易，否则就不可能有交易。

当然，交易一方甚至双方在决定交易时可能犯错误或者以其他的方式被误导。当然，同样地，交易的任何一方的实际情况，即实现交易比没有交易更好的情况下，可能在许多方面是不公平的或者效果不好的。但是，这一切都是偶然的，因此与目前的问题无关，即：“对于贸易的恰当看法，什么是和不是至关重要的？”在此，双方都满意的性生活比起为赌钱玩扑克而言是更为合适的类比。因为，在前者中，各自的满意相互地取决于对方的满意，然而后者实际上是零和游戏，因为在这一游戏中一方所赢得的恰恰等于另一方的损失。

试图得出贸易必然涉及零和对抗的结论在于以下的事实，即相比于他们实际发生的交易，买卖双方将经常会（如果他们不得不）支付更多或收到更少。显然，在这种情况下，就会有把可能获得的更多[商品或者价格]或者可能给予的更少[商品或者价格]视为是交易一方向另一方放弃其利益。虽然这往往是可能发生的，但是实际上并非总是如此。买卖双方可能，而我通常认为，事实上，他们对于这种可能但未取得的利益，同时处在类似的情境下。作为一般结论，推断交易一方取得的所有贸易收益必然损害另一方，不可能正确的。

另外一个理性不足但在实践中更为有力的诱惑在于令人讨厌的人类偏好，即人类会带着强烈的妒忌心关注他人的收益，而不是从自身中找到一个适度的满意；因为实现的交易对另一方有利，人类会忘了该交易对自身也有利。就像你无礼坚持的那样，另一方“没有你，就无法获取他的利润”，但是在与他交易中你也看到了一些对你的利益，难道这不是事实？然而，这是多么真实，“极少人可以被说服，他们得到的比他们出售的要多，不论其收益有多惊人；同时，当利润如此微不足道时，他们仍会憎恨那些出售商品给他们的人。”<sup>16</sup>

### **亚里士多德就高利贷的错误：除非人们不再有购买商品和服务的希望，消除货币不会使人少贪财**

同样不幸的是，亚里士多德下一个“贡献”同样重要。引述的最后一段说：

高利贷者贸易是最讨厌的，而其原因是...货币只是作为一种交易的手段而产生的：高利贷试图使货币增加。这就是我们通常使用这个单词（tokos，在希腊文中也指后代）来指称利息；因为后代与其父母类似，因此金钱所产生的利息就像产生孳息的本金一样，并且它可以被称为“货币、货币的儿子”。所以，我们可以明白在所有进行获取的模式中，为什么高利贷是最不自然的。<sup>17</sup>

---

<sup>16</sup> 曼德维尔，同前，引用自第 113 页。

<sup>17</sup> 亚里士多德，《政治学》，1158B2-8，麦基恩主编，同前，引用自第 1141 页。

起先是由于亚里士多德，更多地因为其在中世纪的后继者，“高利贷”至今是个如此邪恶的词汇，以至于我们可能在最初未能意识到亚里士多德反对的是什么。他不仅反对那些极高的固定利率，即在时下被谴责为高利贷。他也不是反对此类所有的固定利率，就像我们将很快看到的，那些是亚里士多德中世纪的接班人的首要目标。在这里，亚里士多德反对的是任何基于金钱投资产生的任何金钱回报。他认为，钱滋生钱是违背自然规律的。

当亚里士多德的观点受到肯定时，其所反对的和支持该反对的理由都是迷信的和混乱的，这凸现很明显。因为一笔金钱可以转换为其能够买的等价的商品或者商品的集合。因此，作为金钱的回报无可厚非，除非，这与为了商品的使用[权]而要求金钱或实物作为回报是一样令人厌恶和不自然。

从金钱本质的这个解释中，可以得出三个推论——这些推论的作出进一步引用了不仅仅作为古物研究兴趣的亚里士多德。首先，言及任何金钱动机必然在心理上毫无启发，同样的道理，基于各种唯利是图的动机之间的一系列经济上差异，尝试开发出一套完整的经济心理学，更无法使人获益。因为想要获取利润或者挣得工资的人没有告诉我们，其为了什么而想要这些金钱。几乎任何欲望都可以表现为对金钱的欲望。很明显，这是金钱在本质上作为交换的普遍工具的必然结果。亚里士多德本人在别处作出了这一关于金钱本质的观点。然而，就像我们刚才所看到的，他无法认识到金钱在当下的应用。

第二个推论是：消除货币或者甚至是缩小金钱可以购买的所需商品的范围，可能会自动地减少贪婪和竞争，这样的希望必然错误的。当然，利润动机、固定利率动机、工资动机，和到目前为止被列出或者提示的所有其他人为的经济动机，都是唯利是图，这是一再赘述的事实。也就是说，所有这些可以被定义为获取金钱。因此，这看起来好像，为了完全废除货币或降低其作为一种进行获取的工具的重要性，必须制止或者至少是削弱所有唯利是图的动机。

毫无疑问，在一个适当的虚无的意义上，这是事实。然而，除非这些变化碰巧伴随着某些特别的的东西，即当下人类本性的一个巨大的转变，否则人们大概会继续追求、争夺，他们一直想要但如今金钱购买不到的任何东西。总之一句话：如果汽车不是为了获得金钱而出售而是作为公共办公室的额外补贴，那么，自动地，这将唯有加强对这种有特权的官方职位的竞争，东欧苏联式的经济体（STEs）的近距离观察者早已熟悉这一结果。废除货币，将我们从唯利是图的状态中拯救出来，是同样毫无意义的做法，这一做法就是用单词 *gender* 替代 *sex* 以把我们从天性原罪中拯救出来。因为，仅有其自身，而缺乏上述的人性转变，废除货币无法也不会降低我们的物质性或减少我们之间的相互竞争。

### **金钱和贸易极大拓展了人类的选择**

第三个推论是，金钱和其能购买的商品和服务范围的扩展是极有力的选择工具。如果提供的回报不是金钱而是实物，那么接受人则不允许进行选择：选定回报的人不仅决定了回报的大小也决定了回报是什么。举例而言，如果健康、教育和福利服务是由国家垄断提供，在这一程度上，公民被剥夺了对其想要消费的此类服务的数量和质量的任何直接和个人选择。<sup>18</sup>

---

<sup>18</sup>例如，比较一下，哈耶克，《通往奴役之路》，再版，路特里奇与基肯·保罗出版社（Routledge and Kegan Paul）、芝加哥大学出版社（the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1976年，第七章；拉尔夫·哈里斯（Ralph Harris）和阿瑟·希尔顿（Arthur Seldon），《对福利的统治》，经济事务研究所（Institute of Economic Affairs），1989年；阿瑟·希尔顿，《索价》，塔布·史密斯出版社（Temple Smith），1977年。

在《哥达纲领批判》中，卡尔马克思宣布了一个很多人认为极有吸引力的分配方案：“各尽所能，按需分配。”看起来，极少人已经意识到这个口号中所暗示的独裁主义和经济紧缩的不祥之兆。（也许，甚至连马克思本人也忽略了。）相比昂贵的奢侈品，必需品是最典型和自然的；并且，尽管我们是最熟知自身的**渴望之物**，但是其他人是如此急迫地告诉我们，我们真正的**所需之物**是完全不同而且通常不合吾意。<sup>19</sup>除了强迫之外，在所有个人激励被消除之后，如何去确保所有人各尽所能？

### **专家们知道其他人的经济需求是错误又陈旧的观念**

如前所述，亚里士多德主张贸易交换在本质上总是剥削的。在同一段文字中，他就获取技术的两种形式作出了一个巧妙但不明确的区分：为了家庭使用的获取和为了金融增益的获取。无疑地，这必然是永久对立命题的第一个先例，就是说，生产一方面为了市场交换和另一方面为了满足人类需求的对立。

虽然这是一个持久的论调，深入的思考应当揭示出这一对立命题是错误的。市场的生产者根本不能指望赚得利润，除非其他人能够和愿意购买其产品。假定，那些其他人 – 也就是我们自己 – 提出以某种方式使用任何我们所购买的东西，则判定满足我们的某些欲望是必需的。最明显不被保证的是，普通人所能够和愿意支付的[商品或者服务]将按照社会主义知识分子的偏好得到改善，他们为自己优于无知者和平民而沾沾自喜，并且控制我们真正和合理的需求。<sup>20</sup>

这里，真正的对立面在于市场经济和计划经济之间。在前者中，生产者生产他们相信能够找到人能够和愿意购买的商品。在后者中，所生产的是实际的权力精英命令应当产生的商品，这可能是那些权力精英自身想要的商品和他们认为我们这些人真正需要的商品的组合。在过去的几年里，有关前苏联实际权力精英的偏好结构信息比之前更多且已经唾手可得。借用罗伯特·李将军的话描述一下苏联的军队 – “那些人” 为了维持和扩展自己的力量，最想要的一直是巨大的和有效装备军队和警察部队。<sup>21</sup>按照民主资本主义的标准，那些精英认为的足以满足苏联人民需求的剩余生产是极为可怜的。<sup>22</sup>

### **市场贪婪的批判中存在的最后及致命的缺陷**

因为假定人们受到利润动机驱策，所以，相比于社会主义的替代方案，竞争的资本主义经济必然是特有的且内在的自私，而这一论断有个最终和致命的缺陷。此论断依赖于一个错误的推论形式。这一错误的推理形式，始于有关归因于企业及其设立人之目的的命题，终于有关潜在的企业管理者及员工的实际执行动机的结论。

毋庸置疑，任何希望继续营业并且无法获得任何无限制补贴的公司管理层不得不始终留意账本底线。然而，从私营企业的这个基本和无可争议的事实中，最明显的是，我们无法推断出，赚取和

---

<sup>19</sup> 例如，比较一下，第五章，“渴望之物或者所需之物：选择或命令？”，在傅卢的《普罗克鲁斯忒斯的政治学》，普罗米修斯出版社（Prometheus），1981年。

<sup>20</sup> 例如，见，约翰·肯尼思·加尔布雷思，《丰裕社会》，霍顿·米夫林出版公司（Houghton Mifflin），1958年。

<sup>21</sup> 例如，比较一下，比较亨利·罗文（Henry Rowen）和查尔斯·沃夫（Charles Wolf）主编，《贫困的超级大国：改革和苏联的军事负担》，当代研究所（Institute for Contemporary Studies），1990年。

<sup>22</sup> 例如，见，尼克·爱波施塔特（Nick Eberstadt），《共产主义的贫困》，学报书籍公司（Transaction Books），1988年。

获得最大化的利润是必然的，也是贯穿管理层整个工作时间的排他性和最重要的目标，更不用说，这必然是全体员工最主要的或者事实上是非常显著的目标。

从长远来看，持续盈利是继续经营的一个必要条件。但是，这绝不是一个充分或者很好的理由去坚称，为了开始经营或者持续营业，人们能够或者确实持有的唯一动机是为自己获得最大可能的利润。此外，不仅推出这个愤世嫉俗的结论的论点是错误的，而且这个结论本身在现实中也是错误的。因为，我们极少有人能够做到对任何事物完全的一心一意。同时，很多人有理由对如下事实感到后悔，即这种专一的利润导向与其投资的企业特点完全不同。那么无疑地，每个人都必然有大量此类的易于掌握和深思熟虑的处置经验（这种处置显然不是由一个纯粹的和排他的追求金钱增益的动机而驱动）？

当然，以下也不是事实：某一特定的生产企业是国有垄断企业，或者有其他专门为了公众利益服务而设立的其他组织，能保证那些受雇于上述企业或组织的人员已经是或者因在这样的企业或者组织中被鼓励去增加其利他性、减少其唯我独尊，而且比之我们其他人，他们更加信赖他人、更少进行任何“利益的理性计算”。

如果普朗特教授真诚地相信这是一个保证，那么给出任何可能的有效救济是非常困难的。然而，一些介绍性读物可能会有帮助：公共选择经济学中的技术性读物<sup>23</sup>和/或《是，大臣》这样更为愉悦的趣味性读物。<sup>24</sup>

有个令人不适的问题应当抛给普朗特教授以及所有那些与之共享对经济主体的动机产生冒然兴趣的人们，这个问题非常简单，即“为什么？” – 或者，更具侵略性的是，“以什么权利？”如果有人以具有竞争力的价格向我出售令人满意的产品，那么，探查他们的动机 – 即最初获取这些产品然后出售给我以及其他能够并愿意支付所定价格的任何人 – 不是我所要关心的。

如果真有如此私密的调查，那么把它合理地留给人们自己选择的精神顾问吧。对于我们所有人，这里最能使我们获益的例子是英国女王伊丽莎白一世。她曾经坚持道，她希望没有探查人类灵魂的窗户。对于最有才华的和最具自由倾向的统治者，无论臣民的私人动机和信念是什么，他们始终实践忠诚和服从，这就足够了。

通常，结果是评价经济安排最好的标准，这是具有广泛意义的思考。把精力放在产品的价格和质量上。不要过分探究生产者心灵的纯洁。热衷于这种不恰当但干扰性的探究，会被诊断为源自对社会主义未能通过最具决定性的结果检验这一事实的拒不接受，以及对呼吁社会主义假定的利他主义意图可能拯救社会主义的濒死希望。

然而，在关于动机问题的不恰当之处，关于利益的问题可能会切中要点。因为即使是最不谨慎的人，必然会始终希望并尝试确保，供应商与商品的提供并使购买者满意之间存有利益；这些利益是否给予供应商主要或唯一的运营动机，在此毫不相关。供应商与购买者的满意没有利害关系、购买者不得不依赖于“公共服务动机”的广泛出现和实力，即某一商品的稀缺人人皆知时时存在处处可见，那么，这种情况下，购买者无需对此愤世嫉俗，对[商品]供应的质量和可靠性感到焦虑。发展经济学最早和最杰出的学者，像往常一样满怀人性而又基于现实地写道：“我们盼望的

---

<sup>23</sup> 一本非常好的短篇入门读物是威廉·C·米切尔（William C. Mitchell）的《政府，如其所示》，经济事务研究所（Institute of Economic Affairs），1988年。

<sup>24</sup> 乔纳森·林（Jonathan Lynn）与安东尼·杰（Antony Jay），《是，大臣》全本，哈珀与罗出版公司（Harper and Row），1988年。

晚餐，这不是来自屠夫，酿酒商或面包师的恩赐，而是他们对于自身利益的考虑。我们不是与他们的人性交谈，而是与他们自身的利益交流，从来不要言及我们自身的需要，而要谈论他们的利益。只有乞丐会选择去依赖于同胞的恩赐。”<sup>25</sup>

---

<sup>25</sup> 亚当·斯密，《国富论》，斯金纳（A.S. Skinner）和托德（W. B. Todd），自由出版社出版（Liberty Press），1981年。